

毕馥华 杨成潜 编

ZUO
JIA
YU
QING
NIAN



作家与青年

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家与青年

毕淑华 杨成潜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总主编：李敬泽

顾问：王蒙 张洁 刘心武

编委：李锐 钟明善 赵晓生

编辑：陈新宇 孙海英

设计：王海英

制作：王海英

印制：沈阳市新华印刷厂

装订：沈阳市新华装订厂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发行：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作家与青年

毕淑华 楠成海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字数：181,000 开本：787×10921/32 印张：8 $\frac{1}{2}$

印数：1—5,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贵田

责任校对：崔淑芹

封面设计：张希传

统一书号：10371·30 定价：1.30元

ISBN 7-5382-0028-2

前　　言

作家与青年，似乎不能并列而谈。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割裂。试想，哪一位文学青年不希冀成为作家？哪一位作家不是从文学青年走过来的呢？

从无名到知名，从青年成长为作家，中间有一条把二者连结起来的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成功之路呢？是平坦，还是崎岖？是长满荆棘，还是铺满鲜花？……

本书收入了三十位作家与文学青年的通信。老、中、青三代的著名作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用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向青年揭示了这条成功之路的奥妙！

积三十位作家的创作实践经验表明，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知名作家，除了他本身的文学天赋之外，时代、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染色体，是每个成功者走过的路基。他们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深入到生活的海洋里，沐浴着阳光，迎接风浪的洗礼，从而练就善于洞察世界的双眸，磨砺色彩斑斓的手笔。去寻觅，去探求，他们在轰鸣震耳的时代交响乐中，捕捉住拨动人们心弦的主旋律；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里，去发现陶冶人、净化人的美。有人讴歌：“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也有人断言：“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显然，这些话蕴意深刻，发人深思。

积三十位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对文学的挚爱，勤勉的学习劲头，百折不挠的毅力，这些是他们成功的必备因素。完全可以这样想象：当他们尚未成功，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尝过失败的痛苦？会不会也收到退稿信？会的，会的。还可以再进一步推想：他们之中的哪一位，假如当年因为某封退稿信而失去了信心，放弃了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中断了学习与创作实践，那么他还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吗？固然失败是痛苦的，但是经历过失败的痛苦后获得的成功，就更加有意义，也就更感到欣慰。

三十位作家，每人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体验，有各自不同的起点与道路。然而上述两点却是相同的。从他们的经验中，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从青年到作家，有着一条崎岖的路，甚至会遇到荆棘与坎坷，然而，这又是一条五彩缤纷的路，盛开着艳妍的鲜花。

没有一位作家是靠读什么“写作知识”之类的书本培养起来的。这三十位作家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诚然如此，学习基础知识与理论却是必须的）。然而，《作家与青年》绝不是一本“写作知识”读本。它是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宝贵经验，是作家文学生涯的甘苦记录，它更是作家们对文学青年寄予的希望和奉献给青年的关切之心。正因如此，这些文章在《海燕》文学月刊发表以后，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欢迎，纷纷要求结集成书。现在，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也算我们做编辑的献给作家与青年的一片赤心。

编 者

1987.2.1

目 录

重要的功课	达耀	1
在思索中争取突破	邢刚	11
注意作品内容的超越性	宋学武	21
苦恼，是创作的动力	刘兆林	28
作家之路实难言	张石山	36
人物，就在我身边	孙少山	43
第一次	王安忆	49
思考·探索·追求	彭见明	56
真实与感受的谐和	母国政	65
当你提笔之前	李国文	72
从散文领域走进小说天地	王中才	81
讴歌人民是天职	刘舰平	89
选材要严	金河	99
怎样积累生活	叶蔚林	108
人物积累刍议	陈建功	118
我的几篇小说	杨东明	126

关于诗的品格	公 刘	132
灵感，从远方走来	晓 凡	145
从自己身边写起	叶 半	154
作家，小说与我之关系	楚 良	162
生活，文学和我	何士光	169
欣逢盛世，喜见长篇	陈 玥	176
漫谈散文	徐 刚	185
注视着什么？	雷抒雁	195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张笑天	200
寒下问春	刘绍棠	210
论联想	丛维熙	217
创作随想录	张天民	222
生活·思考·创作	王 蒙	230
生活·时代·作家	蔚 军	248

寄园集

重要的功课

达耀同志：你来信已收到，你的问题我已照办，你不必过于焦急。你们好。

我是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我很喜欢你们的作品，并且曾听过你们做的报告。今天，当 I 遇到一些认识不清的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你们，想向你们请教。

我们班级的那些爱好写作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创作小组，我是其中的成员。我们常常讨论作品或理论问题。最近，我们小组讨论了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不料，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竟然会有几种看法，且争执不下。我听不懂也理不出头绪。他们只能是空讲道理，我想最有发言权的是坚持深入生活的作家自己。我知道你们是经常到下边深入生活的。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曾经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可以说已有了生活积累了，为什么还要下去深入生活呢？来信谈谈这方面的体会与认识，好吗？

盼你们在百忙中予以回信。

文模 即領其事，不以爲難。故曰：「**度量**」。

廖曼同志：

你好！出去几个月，刚刚返回大连，从一大堆邮件中读到你的信。因忙于处理各项杂务，没有及时复信，请原谅。

你在信中问我们是如何深入生活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对于一个不断有所追求的作家来说，却永远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犹如一个在校学习的中学生，只要他还没有毕业，就会有做不完的功课。

说到中学生，我们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两部反映中学生生活的作品。一部是苏联电影《中学生圆舞曲》，一部是美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知你看过没有？这两部作品所表现出的观点，也许可以商榷。但它们以中学生为题材，却能展示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学生圆舞曲》写的是一个女中学生的爱情故事。她钟情于一个男同学，在毕业前夕与他同居并怀了孕。后因性格不合，又分手了。她想堕胎，但在手术之前，通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终于留下了孩子。此后，她从家庭出走，自食其力，历尽艰辛。在一次校庆时，她重返母校参加聚会，与当年的情人偶然相遇。尽管一度旧情萌发，但终究还是只身离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六岁的男中学生。作品叙述了他在第四次被开除后，不敢回家，而去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的经历。这两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作家都没有把自己的笔局限于相对来说

比较单调的中学生活，而是通过主人公的某种特殊遭遇，把笔锋转向了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这不仅为人物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天地，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学生圆舞曲》在叙述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的同时，还表现了她的父母的离异过程。这样，这部作品就不单是一个女孩子爱情故事，而成为一部表现当今苏联家庭解体问题的社会悲剧。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则通过少年霍尔顿的经历，表现了美国中产阶级及其子弟的苦闷、彷徨，以及整个美国社会的虚伪和荒唐。这部仅仅十几万字的小说，在美国畅销三十年而不衰，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青年所喜爱的读物，不仅因为它的叙述方式的新颖、巧妙，更重要的，是它为青年提供了一个窥测美国社会的透视镜。

请你试想一下，假如上述两部作品的作者，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对社会生活进行透彻而精微的分析与体验，他们能把一个中学生题材，写成具有如此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吗？

不错，正如你在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别人不可取代、不可重复的生活经历，也都有可供自己进行艺术加工的生活积累。但仅有这些，恐怕还很难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人的感觉很怪，常常是对周围陌生的人或事看得比较冷静、客观，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而恰恰对自己看不大清，这大约就是人们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在二三月间，我们去淮河边的珍珠城蚌埠参加一个笔会。之后去南京，乘船溯江而上，过芜湖，抵九江。因时间仓促，未能登临庐山，只在迷蒙烟雨中，远远地

瞻仰了一番它的雄姿，确实领略到它的奇伟和壮美。但同行的一位旅伴说，他去年夏天曾去庐山一游，身临其境，则完全是另一番感受。对待生活，包括自己的生活，想必也是这样。为了更深刻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生活，有时恰恰需要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里走出来，离得越远越好。猛回头，大概就能看得更明晰些了。

这次我们在北京出席发奖会，见到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两年前的此时，在北京同样的一个会上，我们初次相识。后来一直留意他的作品，确实是越写越好。透过他的作品，你几乎能够看到一个只有一万七千人的山林民族的整个历史的、现实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他的作品，除了审美价值不去论及，即使在认识上也有着巨大而长远的价值。也许你会说，他本人就是鄂温克族，还能写不好本民族的生活吗？问题不宜这样提出。难道我们是汉族，就一定能写好汉族的生活吗？乌热尔图告诉我们，为了写好本民族的生活，他常常往外跑。跑到汉族地区去，甚至跑到几千里外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去。他说，只有当他把本民族的生活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加以比较的时候，他才更强烈而鲜明地感到，什么是本民族所特有而非其他民族所有的。这样，从选材、提炼，以至于构思和行文时，他都有意识地强化这些特长。于是，他笔下鄂温克族的猎人就绝不是拉祜族的猎手，他燃起的那堆《琥珀色的篝火》，就绝不同于苗家山寨里的火把。

对于一个人的认识，需要比较；对于一种生活的认识，就更需要比较。我们这几年写稿、改稿，参加笔会，经常到处跑，更多的是来往于大连和北京之间。我们常常把这两个

城市加以比较。而且往往出现这样一种异常的情况：我们那些表现北京生活的作品，是在大连写出来的，如《在初春的旧子里》和《卖书》等；而一些表现大连生活的作品，却是在北京写成的，如《卖海蛎子的女人》和《除夕夜》等。这也许是离开某一种生活远了，反而能对它看得格外清晰的缘故。当然，这种“远”必须是由“近”及“远”，仅有“远”而没有“近”，也是不行的。更铁生的获奖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的评论者甚至在标题中的“遥远”二字上做了文章。这并非文字游戏，也不是烦琐考证。因为恰恰是这“遥远”二字，寄托了作者一股绵密而深沉的情思。扯不断，剪不断。时间越久，想念越长，路途愈远，情感愈深。如果说，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十年前黄土高原插队生活所赐予的，那么，作家创作这篇作品的灵感和冲动，却是从这十年在北京的卧病生活中所体验到的。

许多成功的作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生活圈子里，那只能限制自己的眼界，变成生活上的短视者，由此势必造成作品所概括的生活的狭隘。这几年，我们不断扩大着自己的题材领域，把过去经常停留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笔触，渐渐伸到了普通的青年、工人，甚至农民的身上。因为我们发现，许多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的当了兵，有的做了工，“有的嫁给了农民，也有的移居国外，或是当保姆，做仆役，极个别的变成在全球飞来飞去的商人。看起来，谁想要真实地、准确地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如果不熟悉其他阶层的生活，那就几乎无法成篇。”

这些年，大家都认为我们是擅长描写知识分子的，其实我们是愈发觉得难以胜任了。不用说思想和感情，就是在语言上，我们的几个当工人的弟弟妹妹，也使我们感到不那么熟悉了，更不消说那些从山东老家来大连买自行车或缝纫机的堂弟堂妹了。

我们感到了危机，感到了我们那一片“领海”快要保不住了。倘若一味地固守，只能节节退缩，最后陷入一个狭小的角落。我们权衡再三，决定冲出去，到“公海”上去，到大洋里去，到我们完全陌生的、更广大的领域里去闯一闯，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和对生命大有益处的“负离子”。于是，我们去了工厂、农村、航空港、大旅馆……去结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并试着让他们在自己的笔下活跃起来。以《卖海蛎子的女人》为开端，陆续写了《葱茏的落雁岭》、《广厦》、《除夕夜》、《无声的雨丝》、《绿宝石》、《大山里的号声》、《湖畔小夜曲》、《士别丘日》、《亚细亚的故事》等不完全是或完全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其中高下不等，良莠不齐，但我们自己是感到兴奋的。因为毕竟是打开了一点局面。我们想以此作为一种尝试和锻炼，或者说是在预制一些“构件”。假如有一天，我们感到自己的笔，能够比较从容地驾驭各阶层的人物了，我们就将着手建造一座规模大一点的建筑，把那些最牢固最漂亮的构件装上去。不敢奢望那会是一个“全优工程”，但至少也该具有自己的风格。

开拓新的生活领域，不仅可以发现新的人物，也可以获得许多新的思想和观念。这种获取，有时能决定作品的倾

向。生活在不断地变化着，更新着，它常常以崭新的面貌刺激着作者。从而萌生出新的思想、新的意念。伟大的卫国战争仅仅进行了几年，然而四十年来，一代代的苏联作家写出了多少这类题材的作品？有的评论家把这些作品划为三个浪潮。据说又在孕育着第四个浪潮。这不是那场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作家们的认识变化了，深入了。美国作家表现二次大战的作品，几十年来也绵绵不绝，但从没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譬如说战后出现的美国影片《紧急下潜》（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小说《第二十三条军规》，就是从思想意念到艺术风格都截然不同的作品。《紧急下潜》描写了一艘潜水艇的几次战斗，舰长不愧是一位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潜望镜打坏了，潜水艇失去了眼睛。”舰长命令舰艇紧急下潜，他自己则站在甲板上，冒着德寇猛烈的炮火，指挥潜艇冲出布雷区。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也是情场上道德高尚的男人。当他得知副舰长与他的情人相爱，便主动退了出来。影片热情地讴歌了自己的理想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主人公及其伙伴成了一群厌恶战争，终日逛妓院、嫖女人的庸碌之辈。因为当时的越南战争使许多美国人出现了精神崩溃。整个世界在他们眼里颠倒了，混乱不堪。大批青年，特别是嬉皮士们，用颓废和堕落来自我麻醉，表现出不能解脱的苦闷。当作家用这种观念来描绘第二次大战时，就自然出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这种愤世嫉俗的“黑色幽默”派作品。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变革的时代。正象许多人所感到的，这场变革，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将超过我国历

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剧烈的变革将使社会生活的面貌瞬息万变，一切坚信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命运同变革的兴衰联在一起的作家，都应当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获取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观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几年中，每当我们认真地下去生活一段，总会获得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发现。这不仅能使我们写出一些在此之前绝对写不出的正面表现改革的作品；而且也使我们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谈“文化大革命”，我们对它的认识，几年来不是逐步深入了吗？可以设想，随着各条战线改革的每一次新的胜利，我们就会对以往的谬误和荒唐有进一步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我们对自己过去的生活积累，几乎还没有“大规模”地表现过。这倒不是对它过于珍惜，而是希望通过今天和今后的不断深入生活，不断获取新的观念，从而加深对过去那段生活的认识，力争写得更好些。

等你接到这封信时，我们可能又要离开大连了。前段集中时间写了一批作品，下半年想出去走一走。特别是想到农村去看看。在各条战线的改革中，农村是走在前列的。我们并没有计划写多少农村题材的作品，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是想去感受一下，希望能从整体上把握住当今的时代精神。

这次回到大连，听说几位作者，想写写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抵制离开土地去搞商品生产的倾向。殊不知广大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投入商品生产和交换，这正是当前农村改革的主流啊！你看，不深入生活怎么得了？否则那真要落伍了！

一个老问题，却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下次回来，如有新的感受，再谈吧。

祝你进步！

达理



作家达理简介 达理，系作家马大京、陈渝庆夫妇共同写作时采用的笔名。

马大京，男，蒙古族，一九四七年四月生于南京，祖籍山东荣城。陈渝庆于同年七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

他们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他们在北京读完小学和中学，并于一九六五年分别从各自的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七〇年毕业。“文革”期间，由于马大京对文化大革命、对林彪一伙的行径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因而受到了迫害，先后被送到江西某农场和北大锅炉房劳动。一九七三年分配到辽宁师范学院院刊、院图书馆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到大连市文联创作室工作。陈渝庆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辽宁省的一个山区教学。一九七四年调到大连，先后在市建委、玻璃厂任干事。一九七八年调到大连市文联《海燕》编辑部任编辑，之后转到创作室任创作员。

一九七八年他们夫妇合作发表第一篇小说《失去的爱情》，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此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如：《初春的日子里》、《等着我》、《路障》、《卖海蛎子的女人》、《除夕夜》、《土别三日》等短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广厦》、《卖书》、《无声的雨丝》、《红宝石》、

《亚细亚的故事》等。其中《路障》荣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除夕夜》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障》、《卖海蛎子的女人》、《广厦》等分别获一九八一年、八二年、八三年的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文学作品奖。除此，连年来，分别获《海燕》、《鸭绿江》等文学月刊的优秀作品奖。他们合作的话剧《理想之光》获辽宁省一九八〇年戏剧奖。他们的小说结集有《达理短篇小说选》。在改革浪潮中，他们到开发区深入生活，并创作出反映城市改革的长篇三部曲，现已发表《眩惑》、《你好，哈萨克族》。

除小说外，他们还涉足于电影剧本创作，已拍成上映的有《碰海人》（与邓刚合作）、《无声的雨丝》、《姑娘，请看着我的眼睛》。

马太章、陈愉庆创作上的成就，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他们现在被选为大连市劳动模范。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愉庆当选为大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二人均为中国作协辽宁省分会副主席。